

72

H0-43
SP

普通语言学教程

费迪南·德·索绪尔 著

裴文 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语言学教程 / (瑞士)费迪南·德·索绪尔著;
裴文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11

ISBN 7-5343-4335-6

I. 普... II. ①索... ②裴... III. 语言学-教材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405 号

中译本前言

1. 索绪尔哲学思想的发育与成长

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于1857年11月26日诞生于日内瓦(Genève)一个殷实而又有威望的家庭。他的祖父尼古拉-泰奥多尔(Nicolas-Théodore, 1767~1845)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博物学家,在日内瓦大学任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他的父亲亨利(Henri, 1829~1905)是一位优秀的自然科学家。亨利秉承父业,研究地质学,在25~27岁之间,便完成了对安德列斯、墨西哥、美国的地质考察,并收集了珍贵的矿物资料和昆虫标本。他在吉桑(Giessen)荣获博士学位,随后又成为日内瓦名誉博士(honoris causa)。索绪尔就是在这样一个崇尚科学研究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索绪尔祖父的一位挚友阿道夫·皮克戴特(Adolph Pictet)是语言古生物学(paléontologie linguistique)的创始人,也是19世纪中叶日内瓦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在索绪尔很小的时候,他就引导索绪尔学习语言,帮助他掌握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等等多种语言。他的著作《印欧语系的起源》(Origines indo-européennes)和两卷文集《语言古生物学》(Paléontologie linguistique, 2 vol., Genève, 1859~1863)对索绪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索绪尔最初是在皮克戴特的母校霍夫威尔中学(collège de Hofwyl)就读,课余时间常与皮克戴特谈论语言古生物学和词源学(étymologie)。1870年,索绪尔进入马迪纳专科学校(l'institut

Martine), 师从米勒涅 (Millenet) 教授, 从哈斯 (Haas) 的希腊语法 (Grammaire du grec) 入手, 开始学习希腊语。在学习希腊语的过程中, 他发现在两个辅音之间的 n 可以与 a 交替, 于是, 他推断出 $n = a$ 这一等式。经过近 3 年时间的思索和大量的语音实验,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一定的条件下, n 在词语中的某些位置可以导致 n 变成 a。有了这样一个发现, 他便决心尝试制订出“语音的普遍系统”。1872 年, 他写成《语言论》(Essai Sur Les Langues), 其主要论点是: 只要假设 $p = b = f = v, k = g = ch, t = d = th$, 就可以断言任何一种语言中的词语都起源于由两个或三个基本辅音构成的系统。索绪尔当时找到了不少的证据, 比方, R-K 曾是“一切权势或武力的表征: rex〈君王〉, regis〈垄断〉; Rache〈复仇〉, rügen〈抨击〉, 等等。”他把文章寄给皮克戴特, 很快就得到回信。皮克戴特给予他热忱的鼓励, 并因势利导, 一方面希望他继续深入研究语言, 另一方面告诫他尽量避免偏激、武断的结论。索绪尔的这篇文章后来以《试论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的词语可归结为数量不多的词根》为题, 收录到《索绪尔研究集刊》(Cahiers F. de Saussure) 第 32 期 (1978) 上。

由于皮克戴特的建议, 索绪尔于 1874 年开始自学葆朴 (Franz Bopp) 的《梵语语法》(Grammaire du sanscrit), 又研读了库尔蒂乌斯 (G. Curtius) 的《希腊语词源学基础》(Grundzüge der griechischen Étymologie), 他敏锐地发现两位学者思想方法上的分歧。也就是在这一年, 他结识了日内瓦大学拉丁语言文学教授保罗·奥尔特拉马雷 (Paul Oltramare), 并得到许多有益的指导。

1875 年, 他 18 岁, 便顺利进入日内瓦大学学习。按照父母的意愿和家庭的传统, 他专修物理和化学, 但他同时选修哲学、历史、艺术、语言学等课程。经过近一年的学习和研究, 他确信自己将来的事业是研究语言。1876 年春季, 他写信给法国语言学家阿·伯尔盖纳 (A. Bergaigne), 申请加入刚成立不久的巴黎语言学学会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并寄去论文《论后缀 -T-》(Le Suffixe -T-), 又经他的朋友莱奥波德·富尔(Léopold Faure)的鼎力推荐, 1876年5月13日, 他被接纳入会。

1876年10月, 征得家人的同意, 索绪尔转学到德国,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那时正值新语法学派发轫之际, 也是诸多语言学家对语言问题辩论得最为激烈的时候, 而莱比锡大学恰恰又是新语法学家的学术中心。以莱斯琴(S. A. Leskien)、奥斯特霍夫(H. Osthoff)和布鲁格曼(K. Brugmann)等人为首的新语法学派(neogrammairienne)明确宣称: 所有作为机械过程的音变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这些规律不允许同一方言内有任何例外(ausnahmslose Lautgesetze), 同样环境下的相同的音永远以同一的方式发展; 但作为词汇或语法实体的一些特定词语所据以产生的类比构成和再组合, 也同样是历史和史前一切时期的语言变化的普遍成分(参见: Jakobson, “Prinzipien der historischen Phonologie”, TCLP 4, 1931, PP247~267)。他们宣告这些见解是历史语言学所不可或缺的, 并欣然接受带有嘲讽意义的绰号“青年语法学者”(Junggrammatiker, 初出茅庐的语法学者)。索绪尔在这批当时最富创造精神的语言学家的指导下, 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 此外, 他还研修了以下语言课程: 莱斯琴的斯拉夫语和立陶宛语, 胡布斯曼(H. Hübschmann)的古波斯语, 温迪希(E. Windisch)的凯尔特语, 奥斯特霍夫的梵语导论, 布劳纳(W. Braune)的德语史以及库尔蒂乌斯的比较语法。

值得一提的是, 布鲁格曼既是莱比锡大学任教的最为杰出的德国语言学家, 又是个人心理语言学派创始人之一。他撰写论文《论印度一日耳曼始源语中的响鼻音》, 提出“鼻音共振”(nasalis sonans)规律, 这与索绪尔在几年前就总结出的 $n = a$ 不谋而合。这就更增添了索绪尔研究语言的信心。

1878年12月, 年仅21岁的索绪尔发表了震惊整个语言学界的论文《论印欧语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Les 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他把印欧语系语言的元音和响音之间极为复杂的相互关系归结为一些比较简单的交替公式, 推翻了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许多语言学家所借鉴的古印度语法学家的“增长理论”, 奠定了印欧语系语言元音系统新学说的基础, 对以后的语言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篇论文是索绪尔的声誉所在, 它标志着索绪尔一生事业中最为光辉的阶段, 是索绪尔典型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与当时学界潮流相反, 索绪尔不是在空想令人费解的理论问题, 而是在寻求语言学这一科学的真正基础。“没有这个基础, 任何研究都是没有依据的, 是武断的, 是不能确定的。”这是近百年来学术界引用的最为频繁的一句话。

这篇论文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可, 确立了索绪尔的学术地位。

此后, 索绪尔转入柏林大学, 不久又回到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 1880 年 2 月完成博士论文《论梵语中绝对属格的用法》(De l'emploi du génitif absolu en sanscrit), 并顺利通过答辩, 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过去一直被看作是单纯技术性的平庸之作, 现在却有了新的评价: 第一, 论文选择句法作为研究、探讨的主题, 这一主题在当时被各大语言学派所忽略; 第二, 论文根据与绝对处所格的关系论证了属格的价值, 确定了它的区别特征。毛罗对这篇论文作出了得当的评价: “索绪尔提出了新的观点, 语言单位的价值是相关又相对的。”(Tullio de Mauro, Édition Critique, 1972, P331)

索绪尔在获得博士学位的当年便离开了莱比锡, 迁往法国巴黎。当时法国的社会学学说和在欧洲学术界掀起的“格士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ie), 即完形心理学对索绪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常与好友费朗西斯·德·克律(Francis de Crue)等人探讨语言学的诸多问题, 旁听米歇尔·布勒阿尔(Michel Bréal)的课程, 同时在高等研究院(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教授梵语、哥

特语和古高地德语。1887年起,又开设了印欧语文学概况。他的课程得到校方和学生的好评。与此同时,索绪尔积极参加巴黎语言学学会的活动,并兼任巴黎语言学学会秘书,负责该学会会刊的编辑出版,在1881年至1891年这整整10年间,他培养了诸如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1936)、格拉蒙(Maurice Grammont, 1866~1946)、帕西(P. Passy)等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建成法兰西学派,对法国青年一代语言学家的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也与法国语言学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法国国家档案馆至今仍保留着关于索绪尔以外国人的身份获得荣誉勋位(la légion d'honneur)的说明材料。

然而,这样的荣誉并没有能够让索绪尔留在巴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接受了日内瓦大学为他提供的教授职位,于1891年离开巴黎回国。当年冬季便开始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梵语和印欧语系历史语言学概况。他的学生不多,水平也不高,他将主要的精力用于研究立陶宛语和中世纪德国传说,以及拉丁诗人的专有名词字谜。不久,他便结婚,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很少出游,更少与外界交流。

他多年从事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并开设此类课程。根据戈德尔书中所列的学生笔记,他讲授过如下课程:

- 日耳曼比较语法 (1881)
- 拉丁语、希腊语比较语法 (1887)
- 立陶宛语 (1888)
- 印欧语言比较 (1891)
- 梵语 (1892~)
- 希腊语与拉丁语语音学 (1892)
- 印欧语言的动词 (1892)
- 希腊语与拉丁语语源学研究 (1893)
- 希腊语动词 (1893)
- 古希腊碑文选读 (1894)

- 希腊语的名词性、数、格变化研究 (1894)
- 波斯诸王碑文 (1895)
- 希腊方言与古希腊碑文 (1895)
- 荷马史诗的语源与语法研究 (1895)
- 希腊文学作品的方言 (1896~1903)
- 欧洲地理语言学(古代与近代) (1902~1903)
- 英语与德语的历史语法 (1904~1905)
- 日耳曼历史语言学 (1906)
- 古英语 (1906)
- 古高地德语 (1906)

由此可见,索绪尔已经把整个印欧语系的主要语言作为授课内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教语法、语音、方言、古代形式和近代形式,而且还从比较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地理分布的观点进行分析、讲解。他对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有极为深刻的认识,发现这两门学科都是建立在对过去语言的重建与猜测之上,轻视了对语言本身的分析。因此,索绪尔一直在努力摆脱 19 世纪的历史主义,对新语法学派的理论也保留了自己的看法。

1906 年,时逢一位老教授约瑟夫·魏尔特海默(Joseph Wertheimer)退休,学校请他负责普通语言学的教学。从那时起,索绪尔隔年授课,1906~1907,1908~1909,1910~1911。他因此得以宣传共时研究和系统研究,创立新的理论,改革语言研究,当然,他并没有彻底地舍弃历史比较语言学。遗憾的是,1912 年夏天,他便罹患重病,不幸于 1913 年 2 月辞世,终年 56 岁。生前,他没有将他的革命性理论编写成书,他讲课的内容后来由他的学生沙·巴依(Charles Bally, 1865~1947)和阿·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 1870~1946)编辑整理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于 1916 年在法国巴黎出版,1922 年再版,到 1949 年出了第五版,各国语言学家先后把它译成德语、西班牙语、俄语、英语、日语、汉

语等等,这使索绪尔的独到见解名闻遐迩,其影响遍及全世界。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后不久,欧洲就出版了以研究共时语言学为主的学术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叶斯柏森(O. Jespersen)的《语言论》、加德纳(A. Gardiner)的《言语和语言理论》、比勒的《语言理论》以及叶尔姆斯列夫(L. Hjelmslev)的两本重要著作《一般语法的原则》和《论格的范畴》。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使他的语言学思想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得以传播和继承,其中,直接传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理论的有布拉格的音位学派、哥本哈根的语符学派和以马丁内(A. Martinet)为首的功能学派。从30年代起,三派在欧洲形成了空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现在,我们通常认为索绪尔创立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囊括现代语言学中所有的主要学派: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美国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以及转换语法(transformation)。有学者认为,最后这个学派从根本上改变了索绪尔流传下来的语言学观念。他们坚信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问世后,索绪尔所确定的横向组合与关联聚合因素的重要性即被削弱,因为乔姆斯基用了不同于索绪尔的另一形式来说明语言问题,在其理论上使用了不同的聚合类,这些类是在句法规则中使用的,是有效地运用句法规则所必须的。但是,在我看来,只要稍作推理或探究,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索绪尔将其横向组合关系理论加以扩展,使之可以应用于句法方面的话,那么,乔姆斯基的转换规则恰恰体现了索绪尔所提出的横向组合关系。说得明白一些,乔姆斯基有效地应用并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观念,我认为词素组合与句法组合之间其实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performance)更是索绪尔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翻版。只遗憾乔姆斯基没有自始至终坦言对索绪尔理论的借贷。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是布拉格学派,又称功能语言学派。该学派始创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整个30年代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维尔·马泰休斯(Vilém Mathesius, 1882~1945)、俄国语言学家尼古莱·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美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自1928年起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并刊行《布拉格语言学学会会刊》(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他们强调需要用功能的(functional)方法去进行语言分析,认为语言是一个互相之间有联系的单位系统。在音系学(Phonology)这个平面,布拉格学派用索绪尔的理论来阐述音位概念。音素属于parole(言语),音位则属于langue(语言)。他们根据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来确定音位与音位之间的不同,如/d/是“齿龈音”+“塞音”+“浊音”。音位单位在不同的位置上有不同的体现,在连贯的话语中,语音单位的语法功能是重要的,比方,可以作为词语的界标(boundary signal)。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原理》(1939)是布拉格学派的重要学术著作。此外,布拉格语言学派也强调语言的非语言特点,考虑说话者的社会背景、交际的主题、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区别以及其他许多因素。他们反对哥本哈根学派那种将语言视为封闭性符号系统,脱离符号的实体去研究纯粹的关系等研究方法,在他们看来,语言既然是在一定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那么研究这个系统时就不能不考虑它同社会现实的联系,不能不抛开实体去研究语言结构中的纯粹关系。他们所擅长的是对语言的当代形式的共时研究而不是历时研究。具体地说,布拉格学派追随索绪尔的学术思想,对语言进行共时分析,在索绪尔的言语体系和语言结构理论上建立了新的学说。他们广泛探讨标准语、语言修养、功能语体、修辞学、文艺学、诗学、美学等等方面的问题,对修辞学和语体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重视语义标准,主张采用对立论,他们扩大了语言的比

较范围,提出了“分析比较”的原则和语言联盟的思想,这对类型语言学 and 地域语言学的研究是一个不小的促进。为了强调自己的特长,布拉格学派曾明确表示应该把自己称为功能语言学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拉格学派传承并发扬了索绪尔的学术思想。他们最主要的贡献是首次系统地阐明了音系学的任务、原理和研究方法,使它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诸多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1976年,法国成立了以马丁内(A. Martinet)为首的国际功能语言学会,旨在发展布拉格学派的基本思想。

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又称新索绪尔语言学(Neo-Saussurean Linguistics),这个学派的产生以1931年哥本哈根语言学会的成立为标志,于1939年创办《语言学文献》。该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丹麦语言学家、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语言学教授叶尔姆斯列夫(L. Hjelmslev, 1899~1965),他创建了一种语言分析方法,即语符学(glossematics)。他像其他追随索绪尔的学者一样,认为必须把语言看作是某一时期内一个独立配套的自足体系,而不是语文事实的混合物。这样,语言学就是一门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内在的”学科,它有自己的方法论和术语体系。他接受索绪尔关于“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49, P169; 中译本, P135)的论断,认为语言是价值的系统,语言学家应该从完整的语言材料出发,在形式(内部语法关系)、实体(外部物体范畴)、表达(词语或文字中介)和内容(意义)的框架内,按照组合成分的关联聚合(Paradigmatic)关系和横向组合(Syntagmatic)关系对话语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和半代数的程序,目的在于得出基本不变的单位语符(glosseme)。

叶尔姆斯列夫强调:形式的定义是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形式与实体是对立的。他发展这些论点,主张内容的分析不能依赖语言之外的存在标准,而表达的分析(音位学)也不能依赖语音标准。一门科学的对象是成分之间的各种关系,而不是这些

成分本身。只有自始至终完全严格地坚持这一点,才有可能建立索绪尔所设想的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科学而独立自主的语言学。形式与实体都可以分析成最终成分,换句话说,这两种形式各有自己的最小要素,即成素。例如,boy 在语音形式方面可以分析成:/b - o - i/或者 b - o - y,在内容实体方面可以分析成:男性 - 人 - 年幼的。最终成分是不同的,在单个的音位或字母与最小的内容成分之间还不能找到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两个方面是对等的,应该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完全体现了索绪尔的思想。

叶尔姆斯列夫在语言中区分“序列”和“系统”。“序列”是词、短语、句子等形式结构。符号的序列包含内容平面和表达平面,两者都由系统中的要素构成。序列的成分之间,系统的大类、小类、要素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语言归根结底是一套形式要素的关系的总和。

哥本哈根学派试图通过构成要素和关系来说明语言的内在结构,揭示语言的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上以及这两大平面之间各个形式要素的依存关系的网络。他们认为,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描写语言以外的其他符号系统。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American Structuralists),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American descriptivists)。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语言学经历了兴起和迅速发展的阶段,在调查美洲印第安语的基础上形成学派,以注重对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而著称。该学派的核心人物是伦纳德·布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1924年创建美国语言学学会,1925年创刊《语言》,此刊成为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重阵。布隆菲尔德曾于1913年至1914年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进修语言学,受业于莱斯琴(August Leskien)和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等新语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学习新语法学派的历史语言学,他高度评价并严格遵循“格里姆定

律”(Grimm's Law)。他在早期所写对萨丕尔(E. Sapir)《语言论》的评论(Classical Weekly, 1922, PP 142~143)中指出:索绪尔给语言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他的著作《语言论》(1933)最先系统地表述了语言学分析的综合理论和实践,这部著作作为美国结构主义奠定了描写方法的基础,控制语言学理论长达 20 年之久,促进了各派语法及语音学的描写研究。布隆菲尔德以索绪尔理论为指导,强调语言结构的系统性,但又有别于其他主要学派。布拉格学派注重对语言结构的功能进行研究,哥本哈根学派重视结构间的关系,美国结构主义则着重结构形式的描写,主张运用一些可以客观地进行描写的操作方法和概念,把重点放在形式分析之上。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注重口语和共时描写,这是因为美洲印第安语基本上没有文字和历史材料,这一学派从一开始就只能从口语着手进行共时的形式分析。在作形式分析时,不考虑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只研究语言本身,在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上,他们认为形式的对立能决定意义的不同。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确定和划分句子结构的成分,尤其是直接成分分析法,把句子按层次区分出它的组成成分。例如:The dog bit the man(狗咬人。)这个句子首先分成 the dog(狗)和 bit the man(咬人),然后,再将 the dog 分成 the 和 dog, bit the man 分成 bit 和 the man,最后再将 the man 分成 the 和 man。至此,这句话的组成成分是:the, dog, bit, the, man。美国结构主义学派描写中的两个基本单位是音位和语素。音位的概念后来被扩展到包括一切具有音位那样区别作用的语音现象,建立“语素音位”,这是语法和语音结合而成的单位。例如,语素音位 /f/ 是 /waif/ 中的 /f/(wife 妻子,单数)和/waivz/ 中的/v/(wives 妻子,复数)的总括。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结构分析方法已经卓有成效地广泛应用于各种有悠久传统的语言,对世界各地语言学研究和语言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由此可见,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研究都是以索绪尔理论为坐标的,是对索绪尔所提出的理论和思想的阐述、延伸和发展,尽管我们不能说现代语言学的每一个时期的学术特点都可以直接追溯到索绪尔的学术理论上去。

2. 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考证

在语言学史上,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索绪尔本人因此被尊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然而,这部让索绪尔声名大震的著作并非出自他个人的手笔。它是由索绪尔的两名学生沙·巴依(Ch. Bally, 1865~1947)和阿·薛施蔼(A. Sechehaye, 1870~1946)根据部分学生的课堂笔记编辑整理而成的。巴依(在1895~1905年间)和薛施蔼(在1891~1893年间)都曾听过索绪尔的一些课程,但都没有听过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这门课。在索绪尔开设这门课时,他们俩已经成为索绪尔的同事。尽管肩负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尽管没有找到索绪尔本人完整的讲稿,尽管只收集到一部分学生的课堂笔记,但是,他们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竭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了编辑《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项艰巨的再创造工作。这部著作于191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一经问世,广为流传。

编辑出版这部著作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方面,索绪尔知识渊博,眼光敏锐,不断更新授课内容;另一方面,两位编辑者当时得到的索绪尔的备课提纲没有明显的体系性。巴依和薛施蔼最终决定以第三期课程为主,充分利用阿·里德林热(A. Riedlinger)提供的第一、二期的授课内容,对三期课程的学生的课堂笔记进行综合、对比和分析,进而阐述索绪尔的学术思想。客观地说,以这样的方式记录和传达学人的思想,疏漏与偏颇必定难免。但是,巴依和薛施蔼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版了一部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名著。这样

的成就无与伦比！巴依和薛施蔼真正创造了奇迹。弗堡(P. A. Verburg, *Lingua* 2, 1950, P441)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比作语言学中的“哥白尼革命”。事实上,索绪尔的影响和声望就是来自巴依和薛施蔼合作编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这部著作出版后近一个世纪,语言学家对索绪尔学术思想的研究,对索绪尔理论观点的评价,主要都是以这部著作作为依据的,而对 20 世纪几代语言学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也正是这部著作本身。语言学因它而步入现代期。

《普通语言学教程》经过多次再版、重印,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发行。较早的有四种译本:日译本(1928)、德译本(1931)、俄译本(1933)、西班牙语译本(1945)。其他译本都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英译本(1959)、波兰语译本(1961)、意大利语译本(1967)、匈牙利语译本(1967)、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译本(1969)、瑞典语译本(1970)、葡萄牙语译本(1971)、越南语译本(1973)、朝鲜语译本(1973)、阿尔巴尼亚语译本(1977)、土耳其语译本(1976—1978)、汉语译本(1980)。

然而,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语言学研究者越来越渴望认识索绪尔本真的哲学思想。就《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写方式和内容,学者们不断追问:编辑者是否有重大疏漏?编辑者是否做了错误的取舍?编辑者是否误解甚至歪曲了索绪尔的学术思想?《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了索绪尔的哲学理论体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激发了学者对《普通语言学教程》进行考证的热情,考证工作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进入高潮期。的确,因为巴依和薛施蔼都没有亲自聆听过索绪尔讲授的普通语言学课程,加之索绪尔的学问博大精深,两位编辑者对课堂笔记内容的取舍以及对索绪尔学术思想和哲学体系的阐述不可能是无可挑剔的,而依照近半个世纪的考证,已经不难看出编辑者在结构安排和内容表述等方面与索绪尔原创理论体系的差异。参照以后发现的索绪尔的手稿和学生较为详

尽的课堂笔记,学者们总结出《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三大不足之处:

1. 编辑者改动了编排顺序,因而没有反映出索绪尔论点的潜在逻辑顺序。同时,编辑者改变章节主题及侧重点,因而没有完整地体现索绪尔的理论支柱和思想体系。例如,第一部分的《语言的地理差异》被挪至第四部分,且改题为《地理语言学》。而研究者认为索绪尔原本是要通过阐述语言和地理的关系说明时空对语言差异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为下一步区分语言和言语作铺垫。这种改变使索绪尔由外而内的完整统一荡然无存。
2. 编辑者删削了索绪尔理论的部分重点内容,尤其是关于符号系统。第一部分的《语言是符号系统》被改为《一般原理》,语言符号系统的内容因此被大量删削。而索绪尔学术思想上的普通语言学正是以语言共时符号系统为研究主体,即语言是符号系统。这种删削使索绪尔理论的纲领和主干线陷入瘫痪状态。另外,编辑者还删削了索绪尔在授课中援引的大量的印欧语系语言的例证。
3. 编辑者增加了部分章节内容,按照普通语言学涉及的部门分类,将《音位学原理》加入《导论》的附录中。这个部分的内容是编辑者从索绪尔 1897 年所作《音节理论》的演讲中辑录而成的,并非取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课程。这种添加内容的编辑使索绪尔意义上的普通语言学落入俗套。至于像“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la langue est une forme et non une substanc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1949, P169; 中译本, P135),“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语言,是从语言本身也是为语言本身来考虑的语言”(“la linguistique a pour unique et véritable objet la langue envisagée en elle-même et pour elle-même”, ibid. P317; 中译本, P266)等重要论点究竟是编辑者自己所加,还是来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课程或其他课程,就迄今为止的考证,仍不得而知。但权威研究者认为,它们都不是

索绪尔的原话,他们的依据是:无论在索绪尔本人的手稿中还是在学生的笔记中都找不到这些话语。

在考证工作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标志性人物有四位:戈德尔(Robert Godel, 1902~1984)、恩格勒(Rudolf Engler, 1930~)、毛罗(Tullio de Mauro)和斯留萨列娃(H. A. СЛЮСАРЕВА, 1918~)。

戈德尔是巴依的学生,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他继巴依之后主持日内瓦学派的工作。索绪尔的两个儿子雅克斯(Jacques)和雷蒙德(Raymond)将索绪尔手稿札记捐赠给日内瓦对公众开放的大学图书馆,戈德尔对此加以充分利用,于1954年编辑出版了《索绪尔未刊札记》(Notes inédites de F. de Saussure),刊登在日内瓦学派于1941年创办的《索绪尔研究集刊》(Cahiers F. de Saussure)第12期上。1957年,时值索绪尔诞辰100周年,戈德尔出版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e F. de Saussure, Genève, Paris, 1957)这部融版本考证和评注于一体的著作。该书结构如下:

1. 编订《索绪尔稿本溯源》时所用的手稿清单
2. 第一章:普通语言学在索绪尔学术生涯中的地位
3. 第二章:手稿分析
4. 第三章:编订者所做的工作
5. 第四章:从手稿看索绪尔的基本观点
6. 索绪尔语言学术语索引

据戈德尔本人陈述,此书是他将自己历年搜集到的索绪尔原稿以及当初没有被巴依和薛施蔼利用的学生课堂笔记、资料等汇编而成的,其中包括:索绪尔本人的19种札记,7位学生的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课堂笔记,6位学生的梵语、印欧语系历史语言学概况的课堂笔记,里德林热的索绪尔关于静态语言学的讲话记录,戈蒂埃(L. Gauthier)的索绪尔4次谈话记录,索绪尔给梅耶(A. Meillet)的7封信等等。戈德尔以此为基础,论述了普通语言学在索绪尔